

□康永立

前几天路过南新街，走到街南口的老舍故居，向西再一拐进了51号院。原齐鲁大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气很大，南新街也就成了当时济南不少名人住所的聚集地。51号院一进门是一栋洋楼，左拐又是一栋洋楼，走到跟儿前见正门的右上角挂着铜牌，原来这里是舒同、晁哲甫及李予昂旧居，2015年已被列入山东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经过修缮的这栋洋楼，给我一种新奇的陌生感。

米黄色的外墙，不锈钢防盗窗，使这栋洋楼既现代又不失古典。洋楼为上下两层并带阁楼、地下室，上下廊各有五根爱奥尼克石柱，柱头有一对向下涡卷装饰，柱基还雕有“喜鹊登枝”和象征鹤荷（合和）吉祥的中国图案。它是一栋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古典建筑，一直以来都为当时名人、要人居住。

那一年年底，未婚妻向所在单位申请婚房，约有半月时间妻拿了一串钥匙约我去看房，就是南新街51号院。穿过一栋居民楼洞，迎面是一栋青砖青瓦洋楼，见一位女孩正出楼门晾衣服。左拐又是一栋洋楼，它坐北朝南，楼侧面墙上标着2号楼。一眼望去，上下两层爱奥尼克廊柱突出楼体，显得十分气派与典雅，水泥麻面的灰色外墙又使它有别于相邻1号洋楼，这或许是它最初的本色。

从楼右侧拾级而上，矮而宽的台阶上有两扇浅灰色高而窄的旁门，门上镶着红、黄、绿相间的彩色玻璃。妻拿出钥匙打开楼门，迎面是铁红色的木质楼梯，台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尘土，楼板有的地方油漆已脱落。站在中央这才看清楚，二楼是四个房间，两间南屋，一间北屋和一间东屋，中间靠北的地方是卫生间，卫生间内浴缸、坐便器、水池俱全。

妻拿着钥匙打开了西南角的房间，眼前豁然敞亮：房间有二十五六平方米，高度约有四米，站在房中间人就觉得小了、矮了。乳白色门窗套，平整红色的地板，两面墙上竟然有五个高约两米、宽约一米的窗子。西南角的两扇窗子凸出去呈半圆状，室内光线更显充足。靠东边墙上是一排高两米的上下书橱。当我打开一扇平开窗子时，发现中间有一扇一米高可上下拉动的钢丝窗，用手弹弹钢网依旧钢劲而有弹性，钢丝窗外又是两扇上下推拉的玻璃窗。顺手关上窗子，室内静了下来，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。后来带上门，我和妻击手相庆，说着笑着离开了小洋楼。

时间不长单位派人将室内粉刷一新，雪白的墙壁、铁红的地板、栗子色的家具、锃亮的玻璃窗，室内虽不富丽却有喜庆、雅致之感。一应布置完毕，昔日陈旧的房间顿时变得明亮而有生机了，在镜的反照下，“婚房”清新得如同水洗过一般。

结婚前三天，按北方习俗是女方送“嫁妆”的日子，清晨我就打开了楼下的门。九点来钟听到一串脚步声传来，我信步走到楼梯口，却见一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走上楼来，他们走走停停、左顾右盼、边说边议，走到跟前还未等我开口来人便说：“我们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。”上前说话的是一位三十岁开外、穿着黄色军大衣的女同志，还有三位男士。我把他们让到室内，他们见门窗上贴着大红喜字和窗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南新街上的小洋楼



花，便向我道喜，我让他们吃喜糖。那位女同志开口问：“这是哪里的宿舍？”并自我介绍说：“我们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，想借用你的房子拍电影。”我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原来是小洋楼招来了他们，但是此后我却一直未等到他们再来。

我和妻是第一家搬入这栋小洋楼的，新年前楼上搬来一位姓张的邻居，接着楼下又搬来了两对新入，小洋楼成了“新人”的爱巢，不时传来收录机放出的音乐和歌声。楼上楼下的新婚快乐驱散了小洋楼的寂寞与冷清。

冬天渐渐临近，宽敞高大的室内清冷起来，我摸着窗下冰凉的暖气片在想，为什么不让它热起来呢？我买了一个小型家用取暖炉，把窗下的暖气片改装成家用暖气，室内暖和了，这引起我对小洋楼采暖的兴趣。

原来，这栋洋楼设有地下室，楼内的取暖采用了热水上升、冷水下降的原理，是一种自然循环（非机械）的取暖方式，这种方式避免了噪音对室内外的干扰，既安全又实用。室内的散热器是铸铁六柱型，外型细腻光滑，英制铜体的阀门精巧而细致。

春天来了，小院里的玉兰树开花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玉兰花，粉白的花素雅地绽放于枝头，缕缕清香飘着早春的气息，在料峭的春天里格外赏心悦目。窗外的两棵法桐树也渐渐长出嫩绿的叶子，当树枝长满了树叶，蓬蓬松松的树冠遮住了西晒的窗子，绿色的光影映在室内又平添了一份柔和。清晨和傍晚不时有鸟儿在树上啁啾，有时一群鸟儿落在树上此起彼伏地唱和、共鸣。这鸟儿又似和那树上盛开的花儿在争春、在争宠。鸟儿飞了，清

静的小洋楼里愈觉得寂静了，这个春天温馨而美好。

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洋楼，室内酷热难耐。夜晚我们有时登上阁楼去乘凉，阁楼顶是四十五度斜角的灰瓦坡屋面，它除挡住楼内房子的空间外还有一块南北长的空地，周边还设了一圈一米多高的女儿墙，墙的中间是一根根立柱。我们会把躺椅放在上面或躺或坐，直到凉快了再回室内入睡。

那年的八月下旬，一场大雨不期而至。妻因行动不便未回小洋楼，我独自回来后，大风挟着暴雨噼里啪啦地下个不停，窗外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在雨声中睡去。子夜过后一阵阵喧嚣声把我惊醒，就听到邻居张家母亲在说话：“快拿盆子来，这边漏雨了，床上也漏了。”丁丁当当的盆罐声加上滴滴答答的雨点声，我再也难以入睡。此时我打开灯，见正面的南墙在渗水，原来是墙外的雨水管排水不及时渗出来的。室外暴雨如注，电闪雷鸣，哗哗的暴雨声令人心惊。隔壁的邻居不停地在室内来回接水倒水，小洋楼经受着暴雨的考验。

暴雨过后的一天，楼内长廊处的门忽然打开了，一位六十岁开外的老人将南面房间的东西移至东面的房间里，室内看来也是漏雨了。我路过时看到大部分是旧书籍和字画。事后邻居张告诉我：“他是晁哲甫的儿子”。我和妻在小洋楼住了三个春秋，后赶上单位调房搬出了洋楼。邻居们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查询资料得知，上世纪50年代，舒同、晁哲甫和李予昂曾在此安居。现在这栋洋楼已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了这座城市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，也给我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生活记忆。

□鲁北

《井底之蛙》这则寓言故事，大家都知道。像村口老槐树上的蝉鸣，打小就听进了心里。

蛙，在我们当地叫蛤蟆。井中之蛙，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天。

我是一只利津的“蛤蟆”，也就只能看到利津那么大的一个天。

利津是一个县，已经不小了。但比起一个省、一个国家、整个世界，就微乎其微了。

我这只“井蛙”的童年，是在黄河尾间的小村里泡大的。那时的天，是被四野框住的方井：东头的黄河大堤在晨雾里时隐时现，像条卧龙藏在白茫茫的纱帐后；西头的盐碱地泛着霜似的白，太阳一晒能晃得人睁不开眼，脚踩上去咯吱作响，像是踩碎了一地盐粒；南边的棉田在风里起伏，绿绸缎似的铺到天边，棉桃裂开时露出雪白的絮，像撒了满地的星星；北边总飘着渤海湾来的咸腥气，阴雨天时更浓，仿佛能闻见浪花里的鱼鲜味。村里的老人说，咱这地儿是黄河填出来的，每粒土都带着水的性子。

32岁那年，我才真正跳出那口“小井”。是文学这根绳索，把我从土坯墙围起的小村，牵进了青砖灰瓦的县城。记得第一次站在县城依偎的黄河大堤上，秋阳把整个利津照得透亮，气派的百货大楼的尖顶、高耸的农行大楼上的时钟、依城而过的黄河水，都在视野里一一铺展开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“利津够大了”，大到能装下我所有没说出口的心事。

无论是在小村的油灯下，还是在县城的白炽灯下，文学始终是悬在头顶的星。因为这束光，我成了新华书店的常客、图书馆的熟面孔。那些带着油墨香的纸页，被我翻得卷了边，起了毛。鲁迅的墨汁里泡着绍兴的乌篷船，字里行间都能听见船头的橹声；沈从文的笔尖淌着湘西的沅江水，读着读着就像踩进了湿漉漉的青石板巷；汪曾祺的字缝里飘着高邮的鸭蛋香，连带着荷叶的清苦气都漫了出来。这些文字在我心里慢慢发酵，像黄河滩上的老酒曲，酿出些跳跃的灵感，落在纸上便是一行行歪歪斜斜的字，带着利津浓浓的土味。

如今这些文字，竟真能越过黄河的浪，飞过渤海湾的雾了。编辑在电话里说：“你的句子带着利津的潮气，咸咸的，润润的，能漫到读者心里去。”听这话时，我正站在老屋的门槛上，看檐角的雨滴落进天井里的水缸，一圈圈涟漪荡开，像极了那些文字在陌生人心湖里激起的回响。

我依然时常回故乡。每当月色清朗的夜晚，总要沿着村中的小路缓缓踱步。收割后的麦茬倔强地挺立在田野里，宛如大地未写完的诗行；此起彼伏的蛙鸣自水渠中涌出，与草丛间的虫吟交织成绵密的声网；远处黄河的水声隐约可闻，恍若大地沉稳的心跳。这时蛰伏在心底的文字便苏醒过来，在夜色中舒展羽翼，带着盐碱地的粗粝、黄河水的浑厚、渤海湾的咸腥，向着更为辽阔的远方翱翔。

无数个夜晚，书桌前的青砖墙上会渗出潮气，那些藏在砖缝里的文字便顺着水汽沁出来。在月光里它们化作银线，一头系着村口那口老井，一头牵着窗外星辰密布的远方。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带着黄河的泥沙味，吹动稿纸上的字迹，像要把这头的牵挂，送到那头的星空中去。

我是一只利津的“蛤蟆”，也不是一只利津的“蛤蟆”。

从“井口”出发，只为抵达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

【局域网】

井中之蛙